

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生成与演进

陶 禹

内容提要 汉晋都邑赋以备载一方之山川建筑、风物英杰等为主要内容，以空间次序和分类铺排为体制章法，此与古代志书相似而具备“方志性”。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可视作都邑赋先声，二赋初步生成了“方志性”的主题与结构。东汉班固《西都赋》与张衡《西京赋》继起，扩充都邑赋的内容事项并增强其纪实属性。张衡《南都赋》对地方城市进行全面铺绘，完成了都邑赋“方志性”范式的定型。魏晋地方都邑赋竞作，使得“方志性”扩散为书写区域重镇的典型文类。汉晋都邑赋的“方志性”呈现出生成、发展、定型与扩散的历时性线索，并隐现着政治情境转换对文学范型嬗变的牵引。

关键词 都邑赋；方志性；汉晋文学；文学范型；政治情境

都邑赋是汉晋大赋的重要门类。此类赋作以都市为对象，内容涵盖一方之山川、历史、物产、建筑、风习等，结构以空间描摹和分类铺陈为主，凡此三端，皆与后世地记方志相似，故可谓具备“方志性”。清人曾就此提出“赋代志乘”之说^[1]，作为该命题的延续与反思，当代学界普遍认为，汉晋都邑赋与地方志在知识储备、思维结构、精神气质等方面，具有相似、相赖、相通的关系^[2]。诸说诚为卓见，然而这一时期都邑赋“方志性”的内在肌理，特别是其起源与演变问题，尚有待深入细致的考察。

自西汉至东汉再到魏晋，都邑赋的“方志性”经历了从生成、发展到完型的过程，具体表现为题材、内容与体制等方面的动态演进。同时，都邑赋“方志性”的书写对象呈现出从帝京到旧都，进而流散至地方重镇的线索。以上进程均受到相应时段政治图景，特别是中央与地方势力消长的牵引。故此，考察都邑赋“方志性”的发展过程，既可以令都邑赋文本范型的演进获得融贯性解释，亦有机会把捉文学流变与政治情境间的联动关系。

一 《子虚赋》与《上林赋》： “方志性”的肇端

作为西汉大赋的奠基之作和杰出代表，司马相

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3]被萧统划入“畋猎”而非“京都”之类，是以历来讨论都邑赋鲜少涉及此二者。事实上，来自公元六世纪的分类标准无法完全涵盖这两篇作品的主题，长久以来遮蔽了其都与都邑赋的内在一致性：相较于《文选》“畋猎”之目下的其他篇什（扬雄《长杨》《羽猎》和潘岳《射雉》）专注于皇家校猎的动态摄影，司马相如在诸侯与天子苑囿的静态描绘上花费了更多笔墨。尽管《子虚》《上林》的审美对象是园林而非城市，但如同城市是区域特性的浓缩，园林也被作为主人居处世界的微型展陈。在此意义上，天子与诸侯之苑囿正是都邑的等价物，司马相如乃是以猎苑之名铺写城市乃至整片国土。故此，《子虚》《上林》实可视作都邑赋之先声。二赋以铺陈自然地理为内容，以堆垛资源名物为章法，成为都邑赋“方志性”的滥觞。

《子虚赋》的基本内容是齐、楚两国的物力比较。该赋开端即提到齐王挑衅式的发问：“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子虚则“对以云梦之事”^[4]，由此确立了全篇对比争胜的基调。该赋可以分为前详后略的两个部分，子虚与乌有先后铺叙楚、齐二国君主猎苑的地理环境与物产资源，将地区之间的等级评判，外化为君主治下自然环境和物质储备的较量。

子虚的描绘集中于楚王猎场云梦泽，他称云梦仅为楚之七泽中“特其小小者”，却有“方九百里”之阔大，那么其余六泽乃至整个楚国疆域之广袤、物产之无极可以推想，这种手法类似于后代都邑赋将城市作为区域风貌的缩影。《子虚赋》不吝笔墨地对云梦及其周边之自然地理进行铺绘：

其山则盘纡第郁，隆崇聳萃，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陀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垩，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琅昆吾，璚玞玄厉，礞石砮砮。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藭菖蒲，茝离蘼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陟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葳蕤苞荔，薛莎青蘋。其埤湿则生藏蓂蒹葭，东蓍彫胡，蓬藕觚芦，菴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瑇瑁鳖鼈。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梗柟豫章，桂椒木兰，檠离朱杨，楂梨棗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鸛鹤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蝮蜒羆豸。^[5]

这段文字极似一篇楚王后园的方志，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内容侧重于名物铺排，作者不厌其烦地列举山石川泽，以及晦涩的动植矿产名称，而备载一方自然地理恰是地记、图经等方志的基本取向；其二，结构以空间为纲，按照“其东”“其南”“其西”“其北”的顺序架构，间有“上”“下”“中”“高”“埤”等方位切换，叙物则以“其山”“其土”“其石”等领起，又体现出以类相从的特征，这种次第铺陈的章法与志书编纂极为相似。

齐臣乌有先生虽然谴责子虚“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其不甘示弱的回击方式却如出一辙。乌有先以空间结构概陈齐国地理四至：“东踰钜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继而宣称国土幅员极度辽阔：“彷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对于山川动植，他虽未详细罗列目录，却试图用极端的话语压倒子虚所述：“若乃俶傥瑰玮，异方殊类，

珍怪鸟兽，万端鳞岵，充牣其中，不可胜记，禹不能名，禹不能计。”^[6]赋文对齐国的铺写虽然简略，却照应了前文描绘楚国的内容。

《上林赋》中，为天子代言的亡是公虽然反对齐楚“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但他打击地方主义的方式却耐人寻味，他认定诸侯的缺陷是“未睹夫巨丽”，为了证明天子优越性，他制作了一篇关于上林苑乃至整个宇宙的方志。在亡是公口中，天子上林四至为“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并强调“若此者数百千处”^[7]。此言显系夸诞，其用意当如宋人程大昌所云：“此言环四海皆天子园囿，使齐楚所夸俱在包笼中。”^[8]就物产的铺陈而言，《子虚赋》展示出的物质迷恋已令人咋舌，《上林赋》更将这种炫目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通过数段“于是乎”引起的铺陈，以及穿插的“其南”“其北”等方位索引，亡是公提供了一连串恢弘的物品清单，包括上林苑和四周的山林川泽，以及游荡其间的神话般的动植。全篇极尽所能地调用博物词汇，力求用海量的意象与诸侯一较高下。最终，这一交锋以诸侯代表承认自身浅陋告终。可以说，司马相如试图将上林苑打造成微缩的宇宙，其吞吐八荒的气度可视为齐、楚二国方志升级成的“一统志”。

《子虚》《上林》“方志性”的内容和体式，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他们强辩的游说之辞与战略分析被认为是赋体的主要源头之一^[9]，如苏秦说秦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又说韩王曰：“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千里，带甲数十万。”^[10]此类铺陈均围绕共同的主题，即以环境地势和自然资源作为身份与财富的标识，从而将区域之间的竞争外化为物质资源的攀比。战国时代的基本格局是诸侯占据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而帝国统一进程即是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掌控。资源的丰俭关乎诸侯之存亡，由此建立起一种“霸”的逻辑：谁能获取更大的土地，掌握更多的资源，谁就具有更高等级的权威。在西汉初年，这种文化心理由于藩国制度得以延续^[11]。司马相如此二赋“空

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12]，正是将中央与地方纳入此种“霸”的等级秩序内，把二者的交战转化为文辞的对抗，通过将诸侯贬低为天子的劣质版本，他论证了大一统的秩序结构和天子权威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两赋以自然地理为内容，以空间类例为结构，初步生成了都邑赋的“方志性”书写。这种“方志性”的书写趣味实与先秦至汉初的政治秩序相互表里，折射出中华帝国早期对于“大一统”思维的特殊理解，成为都邑赋“方志性”书写的滥觞。

二 《西都赋》与《西京赋》：“方志性”的发展

虽然《子虚赋》和《上林赋》已经初步奠定都邑赋的“方志性”特征，但其事项仅限于自然地理，所叙疆域物产也如司马迁所谓“侈靡过其实”^[13]，因而距离方志全面、严谨的特质仍有相当之距离。至东汉，班固与张衡的《西都》《西京》二赋，在扩张内容与增强纪实性两方面，极大推进了都邑赋的“方志性”书写。

东汉定鼎洛阳，班固《两都赋》对长安与洛阳的铺写由两个势均力敌的篇章——《西都赋》与《东都赋》构成。两者分别定位为“极众人之所眩曜”与“折以今之法度”^[14]，意味着班固对新旧两都采取了迥异的书写策略。此举确立了后代都邑赋的两种基本书写范式，其中《西都赋》继承并发展了《子虚》《上林》开创的“方志性”传统。

东汉初年的都邑赋大都是全新政治情境下文化转型的产物^[15]，《两都赋》也致力于对帝京的“优越性”进行重新定义，《东都赋》中的一段反问将价值观转换展现得淋漓尽致：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峻，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16]

可见，较之西都的险要，东都的鸿德更为可取；比起西都的侈靡，东都的自律更值得被讴歌。帝国有关皇城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动：皇帝不再痴迷于统计收获的奇珍异宝，转而追求成为“地利不如人和”的道德楷模。因此，《东都赋》发挥了《上林赋》结尾“游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17]的模式，用一系列形而上的语汇阐释和树立新都权威，反而鲜少对洛阳作清晰可辨的描摹。这种转折的直接后果是，《子虚》《上林》建立的物质争胜的美学原则遭到帝都否定，“东都主人”用一句“子实秦人”^[18]将之贬抑为一种区域局限和道德缺憾。换言之，以天子之都为题材的京都赋从此抛弃了“方志性”书写。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西都赋》直接借鉴和继承《子虚》《上林》的“方志性”范式，并进一步发展出建筑描写和纪实属性，将城市拆解为四个基本维度，有如一部系统性勾勒长安的方志。

首先，《西都赋》开篇陈述长安位置“在于雍州”，并宣称其为“九州之上腴”和“天地之阙区”。这是“方志性”范式从中央沉降至地方的重要体现，其描写对象不再是总揽天下的王土，而是大一统国家中一个可以被指认的、具有特殊性的区域；其次，该赋增加了对城市历史沿革的追叙，从“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到“大汉受命而都之”且“历十二之延祚”的荣耀，追寻地方历史以确认自身坐标恰是“方志性”的重要内容；再次，同前辈司马相如一样，班固专注于展现长安自然多元性的汇集，由“观其四郊”之“南望”“北眺”领起，继而将视线转向“封畿之内”，按照“其阳”“其阴”“东郊”“西郊”之空间顺序介绍地貌与物产；最后，有别于《上林赋》仅将宫殿作为物产汇集与帝王活动的背景，《西都赋》首次将恢宏的宫室建筑作为专注刻画的对象，逐级摹绘赞美建筑，其中特别注意胙列宫殿名称，譬如叙后宫云：“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欢增城，安处常宁，茝若椒风，披香发越，兰林蕙草，鸳鸯飞翔之列。”^[19]如此详细的载录方式，吻合方志资料性和完备性的特征，这一框架成为后代地方都邑赋师法的典范。

《西都赋》的尾声中，叙述者“西都宾”特别强调，对于那个物欲横流的宏伟都市而言，以

上仅是一份不完整的报告：“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举也。”^[20]此言使人联想起前揭《子虚赋》“特其小小者耳”与《上林赋》“若此者数千百处”之类挂一漏万的话术，也昭示出《西都赋》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之间的渊源。但整体而言，比起司马相如笔法之飘逸，《西都赋》更像一张没有框线的表格，将长安之区位、历史、山水、建筑等班班载录，因而相比《子虚》《上林》，本赋篇章结构更趋严谨完备，这是对都邑赋“方志性”的重要发展之一。

《西都赋》对“方志性”的另一重大发展在于增强赋文的征实属性。班固追随了司马相如铺采摘文的语言风格，却逐渐远离漫无边际的夸张而具有纪实的气质。譬如，《西都赋》中长安的地理面积已从《上林赋》试图囊括整个宇宙的“视之无端，察之无涯”^[21]，收缩为真实的地理形势：“左据函谷二崕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又如，相较于司马相如笔下上林苑试图包罗万象的雄心，班固的文辞更为贴近关中平原的实际情况，其所载宫殿亦可与载籍相互印证，如《西都赋》叙未央宫提及：“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李善引《三辅黄图》证其合乎史实：“未央宫有清凉殿、宣室殿、中温室殿、金华殿、太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22]所以学者认为《西都赋》提供了有关汉代长安更多的真实细节而具备史料价值^[23]，而征实性乃都邑赋“方志性”成立的另一关键进展。

《西都赋》发展成熟的“方志性”，稍后为张衡所继承。《西京赋》描绘长安，首先介绍环伺之地貌，如“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于前则终南太一”“于后则高陵平原”。接着，张衡同样标举“四海同宅西秦”与“高祖之始入”的功业，以彰显这片沃土对帝王的辅佐之史。此外，其摹写地理几乎所有的事项都与《西都赋》的内容一一对应，如山巔水泮之物产云“木则”某某，“草则”某某，“鸟则”某某等，也同样赞颂了堂皇的正殿和后宫^[24]。班固开启的都邑赋征实特性，在《西京赋》中也得到了贯彻，黄侃即赞

其“叙述都邑，理资实事”^[25]。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张衡笔下的西京跨出皇宫，触及城郭和居民的情状，如介绍城郭建制云：“旁开三门，参塗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廓开九市，通闾带鬲。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在帝王后妃之外，首次出现城内“击钟鼎食”的公侯、“轻死重气”的游侠以及“商贾百族，裨贩夫妇”等不同身份、风神各异的人群^[26]。通过这一重要转变，城市不再仅仅是宗教仪式的场地和帝王寻欢的所在，对城门、市肆与市民的刻画，使得这部长安“方志”更加丰富多元。

综上，东汉政教取代武力成为正统的准则，对新都洛阳的叙写偏重德性法度之颂扬，《西都赋》与《西京赋》对旧京长安的描摹则继承《子虚》《上林》开创之“方志性”，在此过程中添设区位、历史、建筑等内容，并增强文本纪实性，从而在结构与内容两方面发展“方志性”，成为后世地方都邑赋创作的轨辙。

三 《南都赋》：“方志性”的完型

尽管《两都》与《二京》令都邑赋“方志性”取得长足进展，然而长安仍旧是一座昔日的帝王之城，宫殿宗庙与皇室娱游构成都市的主体，班、张的笔触也不免延续《子虚》《上林》的帝王气韵。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真正完具，当以对地方都会的全面刻画为标志。

首篇描绘地方城市的大赋，文学史常将之追溯到旧题西汉扬雄之《蜀都赋》，但此作疑窦重重，实难凭信^[27]。另有个别残章曾被冠以都邑赋式的篇题，如东汉初年班彪《冀州赋》和崔駰的《武都赋》，但二者均已被证明不过是纪行类大赋流传中的题目讹误^[28]。目前最为可靠的早期地方都邑赋，当属《二京赋》作者张衡的另一篇杰构《南都赋》，尽管它常被前者的光辉淹没，却定型了都邑赋的“方志性”书写，并揭开了此类赋作由京都向地方重镇转移的序幕。

关于《南都赋》的创作动因向有争议^[29]，然而这类述作未必指向某件具体的“本事”，联系这一时期帝国权利空间的结构转换，特别是南阳

的特殊地位，其旨趣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南都赋》是一篇典型的地方主义文学。东汉的再度统一掩盖了以下事实：光武帝刘秀本人（南阳正是其故乡与发迹之地）是强宗大姓的领袖，直接推翻王莽的亦是南阳地方势力主导的阵营。正如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所言：“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30]光武帝还曾诏撰《南阳风俗传》对“帝乡”表以嘉许。因而地方意识的抬头在南阳最先表现出来不足为怪。不特如此，史载张衡身为“南阳西鄂人”且“世为著姓”^[31]，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到：“昔我南都，维帝旧乡。同于郡国，殊于表章。命亲如公，弁冕鸣横。若惟允之，实耀其光。”^[32]对于家乡的自豪情绪溢于言表。故此，《南都赋》实际上是整个南阳郡的礼赞。

自从班固将都邑赋划分为天子之都与地方之都两种不可通约的范式，后代作者即依照城市的不同等级和性质选择对应的创作路向。作为区域颂歌的《南都赋》，其谋篇布局表现出与《西都》《西京》一脉相承的“方志性”特征，并将之调整为更加契合地方城市的书写范式。

首先，张衡点明南阳区位是“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并将环绕城市的名山大川比喻为守护者和服侍者：“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涓水荡其胸。”其次，如同班固追忆长安的昔日荣光，张衡也不忘提示南都与当朝统治者的深厚渊源，他追叙了光武帝“曜朱光于白水，会九世而飞荣”的龙兴历史，并于介绍城邑时特别选取其祖宅祖庙，以彰显南阳“真所谓汉之旧都”。再次，在地方争胜的语境下，自然资源的品种和数量依旧是判断地区优越性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作者必须将绝大多数笔墨花费在盘点地方资产上，此处仅拈出提纲挈领之句，即可窥见层次分明的结构体式：

其宝利珍怪，则……

其山则……

其木则……其竹则……

尔其川渚，则……其水虫则有……

于其陂泽，则有……其草则……其鸟则有……

其水则……其原野则有……

若其园圃，则有……其香草则有……

若其厨膳，则有……酒则……^[33]

铺陈类叙极其详尽，依靠大量生僻词语制造官能刺激，以至学者感觉该赋“形式比较刻板，像是一篇记载地理物产的簿录”^[34]，或谓之“如游于植物园与动物园一样，又如繙阅熟字书”^[35]。同时，张衡秉承《西京赋》的纪实性原则，所举基本合乎南阳地区的真实情况，具备一定的史料价值^[36]。

此外，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由于描写对象为地方而非都城，《南都赋》没有着墨于前代都邑赋习见的皇家狩猎场面，转而力陈都会中“游观之好，耳目之娱”的贵族活动，包括“珍羞琅玕，充溢圆方”的社交欢宴，“男女姣服，骆驿缤纷”的被褻游乐，以及“荡魂伤精”的乐舞踟蹰等。张衡还宣称当地士人无不沾染皇家的高尚风气，例如“驰乎沙场”的群士，“弘懿明睿”的君子以及“攫戾执猛”的谋臣武将^[37]。总之，《南都赋》详细刻画了南阳的富庶盛景与人才辈出，开辟了展示地方风土世情的窗口，这是都邑赋“方志性”内容的重要增益。

由上可知，《南都赋》在两方面完型了都邑赋的“方志性”：其一，作为首次针对地方重镇的铺写，《南都赋》中南阳的优越性仅限于物质丰饶，以区别于首都的道德权威，进一步明确了区域都邑赋的“方志性”定位；其二，《南都赋》在承接前代都邑赋铺排物产的基础上，发展出地方风土民俗的记录，从而在体制上真正完备了“方志性”。自《南都》之后，都邑赋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成为地方士人竞相制作的文类，“方志性”也成为地方都邑赋的典型范式。

四 魏晋地方都邑赋：“方志性”的流行

诚然，张衡《南都赋》已基本定型都邑赋的“方志性”特征，但东汉开国的前一百多年中，帝国的文学仍然聚焦于都城，鲜有区域能分享南阳的

殊荣。当后汉王朝的气数走向尽头，数量繁多的地域势力在政治版图上重现，最终使得汉朝裂变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三个独立政权。随着都城地位每况愈下，长期被压制的地域意识反弹，汉末三国时期出现了地方都邑赋的创作风潮。

这一时期的都邑赋大都来自建安文坛，代表作有徐幹《齐都赋》、刘桢《鲁都赋》与刘邵《赵都赋》。曹丕分别称呼前两人为“北海徐幹伟长”和“东平刘桢公幹”^[38]，而史称刘劭为“广平邯鄲人”^[39]，则三人故乡分别旧属先秦齐、鲁、赵国地界，易知三赋均是颂美家乡之作。从现存残篇来看，这三篇赋基本遵循《南都》以来的书写体系，将各自故乡诠释为区位沿革、山川物产、城邑建筑、风习娱游等方面的集合体，表现出典型的“方志性”，下表可见其大略^[40]。

	徐幹《齐都赋》	刘桢《鲁都赋》	刘邵《赵都赋》
区位沿革	齐国实坤德之膏腴，而神州之奥府。	昔大庭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都兹焉。	固灵州之敞宇，天下之雄国。
山川物产	其川渚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沧渊。蒹葭苍苍，莞蕪沃若，瑰禽异鸟，辟萃乎其间。灵芝生乎丹石，发萃华之煌煌。其宝玩则玄蛤抱玕，蛟蚌含珣。驾鹤鸪，鸿雁鹭鸶，连轩翬，覆水掩渚。若其大利，则海滨博诸，溲盐是钟。	山则连冈属岭，暄颺峽北。其木则赤棗青松，文茎蕙棠。竹则填彼山陔，根沓阪域。其盐则高盆连再，波酌海臻。黍稷油油，稭族垂芒。残穗满握，一颖千箱。水产众多，各有彝伦。	其南也则有洪川巨渚，黄水浊河……其东则有天浪水府，百川是钟……北则有陶林玄坛，增冰沍寒。西则有灵丘平圃，邪接昆仑。其近则有天井句注，飞壶太行。其珍玩服物，则昆山美玉。其器用良马，则六弓四弩。
城邑建筑	构夏殿以宏覆，起层榭以高甍。龙楹螭楠，山岳云墙。其后宫内庭，嫔妾之馆，众伟所施，极巧穷变。	金阶玉砌，玄栒云柯。应门岩岩，朱扉含光。路殿岿其隆崇，文陛蠟其高甍。其园囿苑沼，骈田接连。	尔乃都城万雉，百里周回。九衢交错，三门旁开。层楼竦阁，连栋结阶。
风习娱游	青春季月，上除之良，无大无小，被于水阳。宗属大同，乡党集聚，济济盈堂，爵位以齿。主人飨盛，期尽所有，三酒既醇，五齐惟醺。烂豚膋羊，炮鳖鲙鲤。砢殷饔戾，壮气无伦。凌高越险，追远逐遁。	贵交尚信，轻命重气。义激毫毛，怨成梗概。且观其时谢节移，和族绥宗，招欢合好，肃戒友朋。及其素秋二七，天汉指隅，民胥袂褰，国于水嬉。	其谋谟之士，则思通神睿。辩论之士，则智凌沮丘。游侠之徒，睢风拟类。爰及富人，郭侯之伦。若乃至季春元巳，辰火炽光，挺新赠往，被于水阳。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以上三篇赋作仅存数量不等的佚文，上表仅略举其隅，但足以见出其基本体制，即依次铺陈地方历史之悠久、物产之丰饶、建筑之华美、人物之英伟，以及豪门贵胄的社交生活。三篇赋作之间并不存在模仿关系，其内容体式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显示出“方志性”已成为固定模式并广泛弥漫。

就现存材料而言，三国时期的都邑赋似乎主要是一种北方文学传统，而吴国云阳人韦昭亦作有《云阳赋》，其内容残损严重，佚文之中，“草则郁金香”^[41]一句，符合都邑赋常见的“草则”某某之句式，又“八乡九市，亭候二六，列树表途，路有庐宿”以及“甘蔗棗柿，榛栗木瓜”^[42]数句，正是叙述城邑与物产之辞，再结合篇题，可大致推断此亦为“方志性”都邑赋作品。

地方文人对创作都邑赋抱持热忱，当与人地相应之理念有关。古代中国很早就在区域特性与居民天性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如班固的著名论断：“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43]曹丕就曾点评道：“徐幹时有齐气。”李善对此解释说：“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亦有斯累。”^[44]可见故乡风土已经成为品评文学和人物的重要指征。而此观念于魏晋尤为凸显，则有赖世家大族兴起的政治结构，战国形成的文化区域是介于家庭、郡望与国家之间的地理单元，因而门阀士族的竞争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地区声望的竞争。东晋裴启《语林》记有“祖士言与钟雅相调”之语：“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45]因对同一区域的居民分享类似的品质深信不疑，人与地便处于俱荣俱损的关系之中，故乡的区域与地理就拥有了奇妙的转喻力量，化身为构建社会身份的重要资源。《世说新语·言语》尝记曰：“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崑巍以嵯峨，其水泝渌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46]其中，“其地”“其水”“其山”“其人”等“方志性”，恰是矜夸地域的主要维度。随着故乡成为地方精英自我认定的重要途径，都邑赋的赞颂很可能帮助供职朝廷的当地人士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因而撰者济济，促进了都邑赋“方志性”书写

的接受。

两晋皇权进一步式微，帝国空间的变动主要表现为单一中心结构进一步瓦解。在此背景下，都邑赋创作风潮遍及南北，包括王彪之《闽中赋》，虞闾《扬都赋》《吴都赋》，文立、傅玄各有《蜀都赋》，还有左思《齐都赋》，顾恺之《湘川赋》等。以上作品多仅存片语单辞，拾其碎金，可见这些赋作均有“方志性”特征，譬如《闽中赋》叙物产有“木则藤虹笼采于峻丛，流星丽光于高林”，“果则口棗朱柿，扶余枇杷”，“竹则苞甜赤箬，缥箭班弓”，“药草则青珠黄连，奉柏决明”云云；又如左思《齐都赋》“崑岭镇其左”与“其草则”之语；再如曹毗的《湘中赋》尚存“其竹则筥篥白鸟，实中绀族”之句^[47]。凡此种种皆可见出，无论在题材、结构或是内容层面，地方都邑赋均已经广泛地采用“方志性”书写。

晋代最受推重的都邑赋当属左思《三都》。该赋基于三分归晋的政治实际和正统性的诉求，故其铺写三都隐然有京都与地方的范式之别。具体而言，《魏都赋》采用正统京都范式，另外两赋延续相似的“方志性”书写。《吴都》《蜀都》叙其沿革，则蜀都“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吴都“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记自然地理，则蜀都用“于前则”“于后则”“于东则”“于西则”等环顾四周，吴都以“草则”“木则”“其竹则”“其果则”“其琛璐则”云云类叙物产；此外，二赋也都落笔于华美的城市建制，以及繁奢的商贸场景和显贵的娱游活动^[48]。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左思对“方志性”的征实追求，他将前贤作品一齐斥作“假称珍怪”“虚而无征”“侈言无验”，并自述作《三都》“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49]。对“本”与“实”的极度推重，不仅将都邑赋求实的“方志性”特征推向极致，且“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与“魁梧长者”，也恰是方志的主要内容。是故《吴都》《蜀都》堪称汉晋都邑赋“方志性”的集大成之作。

总之，魏晋时代帝国权力分散，致使区域性都会成为撰赋的热门对象，形成了地方都邑赋的创作

高潮。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并时之作存在模仿关系，它们却具有类似方志的选题、内容与章法。可见都邑赋及其“方志性”已经扩散为介绍与赞颂地方的基本范式。

余 论

综括上文，汉晋都邑赋取一方名都为题材，以区域自然、沿革、城邑、风俗等为内容，并以穷尽性与纪实性为准则，具备“方志性”的特征。自西汉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到东汉班固、张衡之《西都》《西京》，再到《南都》和魏晋以降众多地方都邑赋，可以勾稽出都邑赋“方志性”肇端、发展、定型与扩散的历时性线索。考察此种赋体的内在特征，有裨于打破单纯以题材或名称划分作品带来的窒碍，从而拈出汉晋大赋特殊的内在理路。

另外，都邑赋的殊荣部分来自它与帝国的亲密关系，其“方志性”的题材转变与体制因革皆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汉晋之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充满张力，作为帝国局势的投影，都邑赋“方志性”的成立也映射出政治隐情，其发展过程与从中央压制地方（《子虚》《上林》），到旧都地位沉降（《西都》《西京》），再到区域势力崛起（《南都》），复又归于纷争（魏晋都邑赋竞作）的大势同步。与此同时，“方志性”的演变轨迹也呈现出由中心向边缘滑动的趋势，构成一个从皇室殿堂向民间场域蔓延的序列，昭示出文学创作与时代图景之间的深邃联结。

值得措意的是，都邑赋创作在六朝以后出现坍塌迹象。其原因诚如时贤所论，与诗赋传统交替、审美思潮迁变等有关^[50]。此外尚有一个关键因素，即记载山水城邑的地记与胪列人物的杂传崛起繁兴，不仅满足“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51]之情感鹄的，也提供了有关地方知识专门化、条理化的记录。都邑描写由文学之都邑赋向史学之地理书滑动的过程，包蕴着从吟咏到载录的兴趣转换，既是六朝文史分离的关节，也标志着都邑赋“方志性”使命的完成^[52]。自是之后，都邑赋撰作虽不绝如缕，但更多是接续一种昔日的文学传

统，汉晋时期模塑的“方志性”已烙印为历代都邑赋最为稳定的基础特征，凝固为包裹在文学深处的浓厚“史心”。

[本文系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地记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项目编号 20wkpy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该说由清陆次云首倡：“汉当秦火之余，典坟残缺，故博雅之儒，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乘志。”参见陆次云《与友论作赋书》，《北墅绪言》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237 册，第 364 页，齐鲁书社 1997 年版。袁枚《历代赋话序》有进一步论述：“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迹，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载浦铣《历代赋话校证》，何新文、路成文校证，第 3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2] 参见许结《赋的地理情怀与方志价值》，《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王树森《“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中国韵文学刊》2009 年第 1 期；杨晓斌《地图、方志的编撰与汉晋大赋的创作》，《文学评论》2013 年第 2 期等。

[3] 《子虚赋》与《上林赋》的创作时间与分篇关系，向为学界争议论题。本文采用刘跃进之说：“《史记》中所说的《子虚赋》，作于游梁时期，似为初稿；而《上林赋》则在此基础上加上天子游猎的场面，加工润色，遂成定稿。”参见刘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其意义》，载氏著《秦汉文学论丛》，第 72 页，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

[4] [5] [6] [7] [14]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6] [33] [37] [38] [44] [48] [49] 萧统：《文选》，李善注，第 119 页，第 119—120 页，第 122 页，第 123 页、第 126 页，第 22 页，第 34—35 页，第 129 页，第 30 页，第 23—25 页，第 30 页，第 125 页，第 22 页、第 25 页，第 37—42 页，第 42 页、第 43 页，第 68—74 页，第 71—73 页，第 720 页，第 720 页，第 75—95 页，第 74 页，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8] 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52 册，第 162 页，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9] 赋体的形成向来是争论不休的复杂问题，最新的评议与结论参见傅刚《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10] 刘向：《战国策》，第 78 页、第 93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11] 根据增渊龙夫的考察，汉初并没有完全消除昔日诸侯后裔的豪门望族之影响，他们之间相互争斗，甚至干预中央地方行政，见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第 402—42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胡宝国发现《史记》与《汉书》的重要差异在于使用战国国名而非朝廷推行的郡名，这一现象还反映在扬雄《方言》的区划上，参见胡宝国《〈史记〉与战国文化传统》与《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并载氏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修订本），第 1—28 页、第 217—23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12] [13] 司马迁：《史记》，裴骃集解，第 3640 页，第 3689 页，中华书局 2014 年版。

[15] 参见王德华《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文学遗产》2008 年第 2 期；陈君《〈两都赋〉的创作与东汉前期的政治趋向》，《文学评论》2010 年第 2 期；许结《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文史哲》2016 年第 3 期；侯文学《权威之域与首善之区——两汉散体都邑赋理念的差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4 期等。

[23] 参见何沛雄《〈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文史哲》1990 年第 5 期；王长顺、张新科《〈西都赋〉“长安事象”证实考论》，《文史哲》2010 年第 4 期。

[25]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 94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27] 本文观点是旧题扬雄《蜀都赋》乃两晋间托名之作，相关学术史回顾与辨伪参见陶禹《扬雄〈蜀都赋〉的知识来源与真伪辨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2 期。

[28] 王子今考得《冀州赋》本题当为《游居赋》，参见王子今《〈全汉赋〉班彪〈冀州赋〉题名献疑》，《文学遗产》2008 年第 6 期。崔骃《武都赋》极有可能是《北征颂》的别称，参见林家骊、孙宝《崔骃四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29] 唐李周翰以为南都时有被废之虞：“南都在南阳，光武旧里，以置都焉。桓帝时议欲废之，故衡作是赋，盛称

此都是光武所起处，又有上代宗庙，以讽之。”参见《六臣注文选》卷四，第8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钱志熙推测此赋诞生可能与顺帝未行巡狩南阳之事有关，参见钱志熙《张衡和他的〈南都赋〉》，《文史知识》2008年第5期。还有一种观点怀疑此赋具有推荐南都参与定都竞争的图谋，参见王欣慧《历代京都赋的文化审视》，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第86—90页，2009年，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彼时朝堂之上仍有迁都的动议。

[30] [英] 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杨品泉等译，第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 范晔：《后汉书》，李贤注，第189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32] 张衡：《张衡诗文集校注》，张震泽校注，第3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4] 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第16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5]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俎工译，第54页，开明书店1930年版。

[36] 以《南都赋》佐助东汉环境史研究者，有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和王子今《〈南都赋〉自然生态史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等。

[39] 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第617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40] 本表录文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中华书局1958年版）为主，并参稽程章灿《先唐赋辑补》（参见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1]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36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2] [47]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辑，第1437页，第1574页、第1882页、第207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43] 班固：《汉书》，颜师古注，第164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5] 《太平御览》卷四六六，李昉等撰，第2143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46] 《世说新语笺疏》，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第93页，中华书局2015年版。

[50] 参见许结《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侯文学《都邑赋兴衰与汉魏晋赋山水之趣的演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4期。

[51] 《史通通释》，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第2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52] 按：匿名审稿专家建议，尚应就汉晋间史学传统乃至社会结构中的“方志性”特征作进一步探索。笔者深以为然，但限于拙文讨论的重心与篇幅，拟俟后另文论之。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赵培